

# 东周时期的矢与射

——以三晋两周地区考古所见为例

□ 张 敏

## 一、绪言

“射”，既是先秦时期军事作战的重要方式，又是当时社会礼制的重要内容，属“六艺”之一。对“射”所用之“镞”的考古学研究，当可从一个侧面揭示古代军事与礼制状况。

以往学界关于“战争”类用镞形制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对于非“战争”类用镞形制的认识则争议颇多。对于非“战争”类用镞，本文将其分为“蒐礼”、“射礼”、“投壶礼”、“弋射”四类，除“弋射”外，很少有研究者讨论其他三类用镞之形制。关于“弋射”用镞形制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以宋兆麟为代表，认为“弋射之矢，箭头有倒刺，箭镞中有孔槽”<sup>[1]</sup>。另一种以丛文俊为代表，认为“把曾侯乙墓那些制作精美的镞视为射出后能够收回的弋射所用箭镞是合理的”<sup>[2]</sup>。何弩从出土背景角度重新论证了丛文俊的观点<sup>[3]</sup>。陈春慧则同意宋兆麟的观点，不同意何弩的观点，认为“平首圆身镞非弋射用镞，而是射礼用恒矢”<sup>[4]</sup>。石岩对中国北方先秦时期的青铜镞进行了系统梳理，对“战争”、“狩猎”、“礼射”、“投壶礼”、“弋射”等用镞形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sup>[5]</sup>。

关于“射”的研究，以往学者多侧重于文献，或者将青铜器写实画像纹图像及汉画像石内容与文献相关联，而缺少从青铜镞出土背景角度的考察，所得结论分歧较大。

鉴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青铜镞为例，主要从青铜镞、青铜器写实画像纹等考古材料出发，注重青铜镞出土背景的考察，同时结合文献记载，辨析不同用途的青铜镞，尤其是非“战争”类用镞的形制。

## 二、青铜镞的形制分析与分期

本文中所说的“镞”即俗称的“箭头”，是安装在

箭杆前端的部分，不包括箭杆。所说的“矢”，包括“箭头”、“箭杆”及“箭羽”部分。在对所收集的青铜镞出土材料进行筛选后<sup>[6]</sup>，共选用205个单位，其中墓葬183座，车马坑2座，尸骨坑1座，灰坑6座，地层单位10个，房子1座，粮仓1处，冶炼作坊1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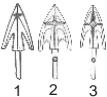









文中对青铜镞进行形制分析的目的有二，一是找出其形制演变规律，二是辨别其功用之异同或地域之差别。首先根据青铜镞与箭杆连接方式的不同分为有铤镞和有銎镞；其次根据青铜镞翼的数目将有铤镞分为双翼镞、三翼镞、三棱镞、异形镞，将有銎镞分为双翼镞、三翼镞、异形镞；最后根据脊与本的位置、镞身与铤的比例、镞身形状等进一步细分（表一、表二）。

本文对青铜镞期别与年代的判断，在参照叶小燕<sup>[7]</sup>、朱凤瀚<sup>[8]</sup>、张辛<sup>[9]</sup>、宋玲平<sup>[10]</sup>、杨建军<sup>[11]</sup>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青铜镞自身形制的演变特征，将三晋两周地区东周时期的青铜镞分为三期。关于春秋与战国分界的年代问题，本文采用公元前453年之说<sup>[12]</sup>。

第一期 年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本期青铜镞的主要形制包括有铤双翼镞Aa、Aa a、Aa b式，有铤三翼镞第一类Aa a、Aa b、Aa、B式。有铤异形镞仅见第一类Bb型、第三类和第四类A型。不见有铤三棱镞。有銎镞因数目太少，不作形制分析，一、二、三期均有。
















第二期 年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本期与第一期相比，除有铤双翼镞Aa、Aa a、Aa b式，有铤三翼镞第一类Aa a、Aa b、Aa、B式，有铤异形镞第四类A型继续使用外，新出现了有铤双翼镞Aa a、Aa b、Ab式，有铤三翼镞第一类Ab a、Ab b、Ab式、第二类A、B型，有铤三棱镞Aa、Ab、Ad型，有铤异形镞第一类Aa、Ba型、第二类A、B、C型。

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青铜镞形制分期表 一)

	有铤镞								
	双翼镞			三翼镞					
				第一类			第二类		
	Aa	Ab	B	Aa	Ab	B	A	B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1.有铤双翼镞 Aa 式 上马墓地 M4078:7) 2.有铤双翼镞 Aa a 式 上村岭虢国墓地 M1052:26) 3.有铤双翼镞 Aa b 式 上村岭虢国墓地 M1703:41) 4.有铤双翼镞 Aa a 式 ( 太原金胜村 M251:738-3) 5. 有铤双翼镞 Aa b 式 ( 太原金胜村 M251:706-1) 6.有铤双翼镞 Ab 式 河南陕县 M2040:287-1) 7. 有铤双翼镞 Ab 式 ( 洛阳粮仓双翼镞) 8.有铤双翼镞 B 型 辉县固围村 M1:95) 9.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Aa a 式 辉县琉璃阁甲墓:39) 10.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Aa b 式 上村岭虢国墓地 M1747:24-3) 11.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Aa 式 上马墓地 M13 式镞) 12.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Ab a 式 上马墓地 63H16M15:32-2) 13.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Ab b 式 ( 太原金胜村 M251:166-1) 14.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Ab 式 太原金胜村 M251:395-1) 15.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B 式 临猗程村墓地 M1059:9) 16.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B 式 洛阳战国粮仓 4 式镞) 17.有铤三翼镞第二类 A 型 山西长子县 M1 式镞) 18.有铤三翼镞第二类 B 型 太原金胜村 M251:49-1)

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青铜镞形制分期表 二)

	有铤镞													
	三棱镞					异型镞								
						第一类					第二类			
	Aa	Ab	Ac	Ad	B	Aa	Ab	Ac	Ba	Bb	A	B	C	第三类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1. 有铤三棱镞 Aa 型 河南陕县 M2040:461-11) 2. 有铤三棱镞 Ab 型 ( 太原金胜村 M251:14-1) 3. 有铤三棱镞 Ac 型 洛阳西工区 M6 三棱形镞) 4. 有铤三棱镞 Ad 型 洛阳中州中路 C1M3729:2) 5. 有铤三棱镞 B 型 洛阳粮仓式镞) 6. 有铤异形镞第一类 Aa 型 ( 太原金胜村 M251:505-2) 7. 有铤异形镞第一类 Ab 型 长治分水岭 M126 式镞) 8. 有铤异形镞第一类 Ac 型 ( 山西万荣庙前 61M1:35) 9. 有铤异形镞第一类 Ba 型 太原金胜村 M251:505-1) 10. 有铤异形镞第一类 Bb 型 长治分水岭 M269:47) 11. 有铤异形镞第二类 A 型 河南陕县 M2040:462-1) 12. 有铤异形镞第二类 B 型 山西省潞城县潞河 M7:121) 13. 有铤异形镞第二类 C 型 洛阳西郊 M4:71) 14. 有铤异形镞第三类 ( 上村岭虢国墓地 M2001:374-1) 15. 有铤异形镞第四类 A 型 河南登封告成 M3:471) 16. 有铤异形镞第四类 B 型 山西闻喜邱家庄 M10:16)

第三期 年代大致相当于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本期与第二期相比, 除有铤双翼镞 Aa b、Aa a、Ab 式, 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Ab a、Ab b、Ab 、B 式、第二类 A、B 型, 有铤三棱镞 Aa、Ab 型, 有铤异形镞第二类 A、B 型继续使用外, 新出现了有铤双翼镞 Ab 式、B 型, 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B 式, 有铤三棱镞 Ac、B 型, 有铤异形镞第一类 Ab、Ac、第四类 B 型。

概括而言, 三晋两周地区东周时期青铜镞的大体发展趋势是:

1. 不论是有铤双翼镞还是有铤三翼镞, 翼由部分附着于脊上, 渐渐演变为全部附着于脊上, 镞身由宽变窄; 翼的弧线由斜直外撇到斜弧内收, 甚至退化为狭刃。

2. 春秋时期, 有铤双翼镞所占比重超过有铤三翼镞, 而战国时期的情况则相反, 总体趋势由有铤双翼镞 Aa 型占大宗, 发展到有铤三翼镞第一类 Ab 型占大宗。

3. 有铤三棱镞、有铤异形镞第一类、第二类到春秋晚期时才大量出现。

### 三、青铜镞的出土背景考察

#### (一) 青铜镞出土状况的考察

##### 1. 墓葬

在本文所收集的 183 座墓葬中, 仅有 71 座出土的青铜镞位置明确, 其中大多数出土于两侧棺椁之间, 头端和脚端亦有出土, 另有少量出土于内外椁或内外棺之间。棺内亦有出土者, 但数量较少。墓葬的

青铜镞主要有以下三种存在状况:

(1) 嵌入人骨中,共4例。应为战争或其他杀伤类行为所致,其形制为有铤双翼镞Ab 式和有铤三翼镞。

(2) 成束出土,共13例。有的与箭箠或弓、弩机共出,其形制为有铤双翼镞、有铤三翼镞、有铤三棱镞、有铤异形镞、有銎三翼镞、有銎异形镞等。有铤双翼镞、有铤三翼镞、有铤三棱镞以10件或50件左右成束出土或装入1箭箠中者居多,似有一定规律,可能以一束10件为常例。有铤异形镞少则2件,多则200件成束出土,似无一定规律可言。

河南陕县M2040所见有铤双翼镞Aa b式2件、有铤三翼镞第一类Ab a式2件、Ab b式5件、有铤三棱镞Aa型4件、Ab型2件共15件出于同一箭箠中,说明有铤双翼镞、有铤三翼镞、有铤三棱镞在用途上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长治分水岭M14出土圆头长身如棒槌错金花的有铤异形镞,与其同出的箭箠上装饰玉器。此种形制的青铜镞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圆身平头,不利于杀伤,应有特殊用途。

(3) 出土于车马坑中,共2例。河南洛阳中州路车马坑东轴M19有铤双翼镞Ab 式1件、B 式49件共50件成束出土于舆内左侧,并与弩机共出,这与战车上主射的乘员位置一致<sup>[13]</sup>。原报告中将该车定为田猎之车。不管是战车还是田猎之车都带有军事色彩,所以有铤双翼镞Ab 、B 式应用作战争等杀伤类行为。河南汲县山彪镇M2有铤三翼镞第一类Ab b式1件出土于西端马骨附近,若为有意识的随葬,应与河南洛阳中州路车马坑东轴M19一样,被用作战争等杀伤类行为。

## 2. 居址和其他遗迹单位

出土于居址和其他遗迹单位中的青铜镞,应为使用过程中因某种原因而遗弃,不带有人类有意识的行为色彩,更能单纯地代表青铜镞作为兵器本身的含义,即被用作战争等杀伤类行为。除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237上出土有铤异形镞第四类1件、山西侯马铸铜遗址T71出土有铤异形镞第二类外,其他单位出土的青铜镞形制主要有有铤双翼镞Aa b、Aa b、Ab 、B 、B 式,有铤三翼镞第一类Ab a、Ab b、Ab 、B 、B 式、第二类B型,有铤三棱镞B型,有銎三翼镞。由此可见,有铤双翼镞、有铤三翼镞、有铤三棱镞、有銎三翼镞极有可能被用作战争等杀伤类行为。

## (二) 出土青铜镞的墓葬等级的考察

墓葬中,除37座限于发表材料而不明青铜镞的形制外,出土双翼镞的墓葬有93座,三翼镞的墓葬有65座,三棱镞的墓葬有16座,异形镞的墓葬有51座。对青铜镞的形制与出土青铜镞的墓葬等级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现象:

1.有铤异形镞第一类、第二类多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共35座。除河南洛阳烧沟M44、山西榆次猫儿岭墓地共5座墓受发表材料所限,无法详知其墓葬等级外,只有河南陕县M2005、上马墓地M6244墓葬等级较低<sup>[14]</sup>。其余墓葬随葬铜礼器或陶礼器,葬具为一椁一棺、一椁二棺或二椁一棺,甚至有一椁三棺者;墓室面积均大于6平方米,有的还有墓道。这些墓的年代除长治分水岭M269存在争议外,均为第二期、第三期。

2.其他形制的青铜镞出土于高等级与低等级墓葬的数量均较多,其与墓葬等级的相关性不明显。

由此可见,有铤异形镞第一类、第二类与墓主人一生的身份及社会地位有一定的联系,而且此种形制的青铜镞不利于杀伤,有着特殊的用途,而非用作战争等杀伤类行为。

## 四、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的矢与射

本文所收的东周时期三晋风格的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涉及到“矢”的形象的材料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三晋两周地区出土,另一部分为其他地区出土。本文将这部分材料根据其画像题材的不同分为“战争”类、“狩猎”类、“射礼”类、“投壶礼”类和“弋射”类五种。

### (一)“战争”类

本文将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有徒兵相搏、水陆攻战等表现战争场景题材的材料归为“战争”类。

标本河南汲县山彪镇M1铜鉴M1:56,其图案分为上中下三层,上下层为徒兵相搏题材,中层为水陆攻战题材。上层中涉及“矢”形象的有五组重复图案,每组为两人,一人左执弓,右抽矢,其前三矢插地;另一人张弓搭矢作发射状,地上插二矢。中层中涉及“矢”形象的有六处图案,除一处张弓外,其余均张弓搭矢作发射状。下层中涉及“矢”形象的有九处图案,均张弓搭矢作发射状<sup>[15]</sup>。

### (二)“狩猎”类

本文将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有射兽、射鸟、射鱼等题材的材料归为“狩猎”类。“弋射”也为“狩猎”的



一种,但因其较为特殊,故单列一类。

标本河北平山三汲 M8101 铜鉴 (M8101:4),其图案由左向右依次表现“射礼”、“狩猎”两种场景。涉及“狩猎”部分的图案,左右各有一辆车。其中右侧车前有四匹马曳车,车上立有两人,一人驾车,一人张弓搭矢欲射;左侧车前有三匹马曳车,车上立有一人驾车,其后插有一戈,车前立有一人张弓搭矢欲射,其前有一兽<sup>[16]</sup>。

### (三)“射礼”类

本文中所说“射礼”为通常所言的“射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其所射为“侯”<sup>[17]</sup>。据《仪礼·大射》、《仪礼·乡射礼》的记载,可以将“射礼”大致分为射前的准备活动、射前的宴饮活动、射的正式比赛和射后的宴饮活动四部分。《礼记·射义》中亦记载:“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根据上述记载,本文将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有射侯、宴饮与射、宴饮与射侯等题材的材料归为“射礼”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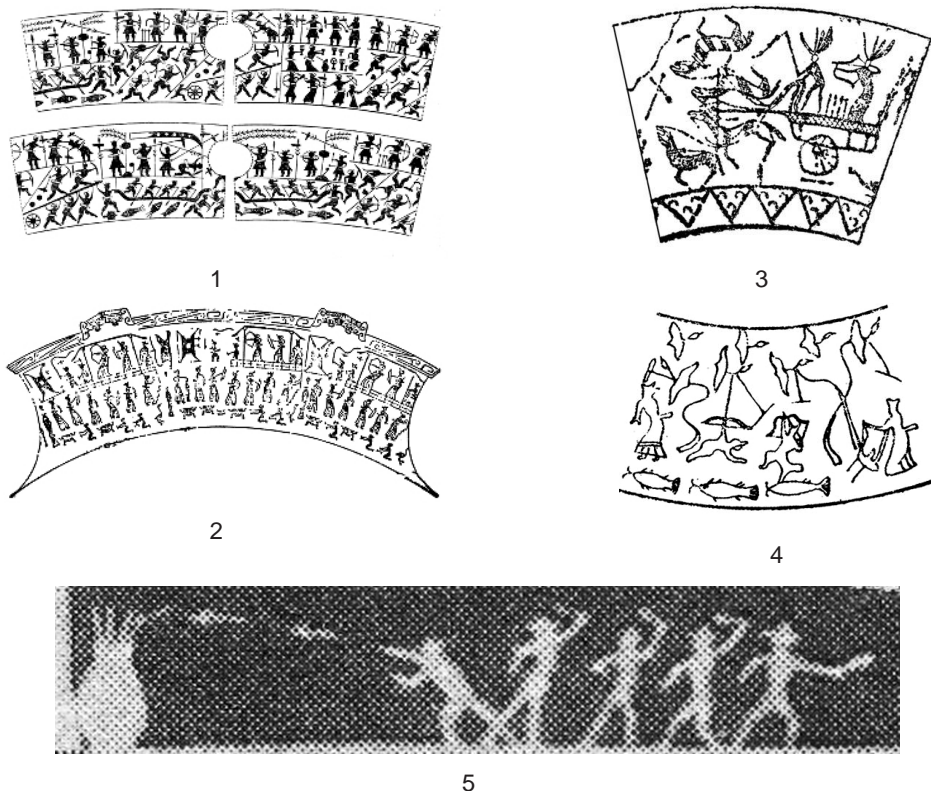
标本陕西凤翔高王寺窖藏铜壶,其图案由上到

下依次表现“射礼”、“弋射”、“宴饮”、“狩猎”四种场景。涉及“射礼”部分的有三组重复图案,每组图案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图案上半部分表现“射礼”的场景,最左侧为侯,侯上插有两矢;侯前立侍一人,手持旌旗,应即文献中所言“获者”;高台前立侍一人,可能为文献中所言“司射”;主持整个比赛的过程;高台上两人,一人张弓搭矢作发射状,另一人持弓站立,应即文献中所言的每组“耦射”的“上射”“下射”二人;高台后一人持弓站立,高台下有六人持弓依次登阶而上,应为参与比赛者,但与文献中所言“耦射”有所出入。另外中间一幅图案,高台下有七人,最后一人不知手持何物,亦不知其何为。图案下半部分有鼎的形象,可能为宴饮之用<sup>[18]</sup>。

### (四)“投壶礼”类

“投壶礼”是古代社会上层贵族在宴饮宾客时所举行的一种活动,由一人担任“司射”,主持整个投壶礼的过程<sup>[19]</sup>。

标本山东省长岛县南长山岛出土战国铜提梁壶,其图案从上到下依次表现“采桑”、“宴饮”、“战



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的矢与射

- 1.“战争”类 河南汲县山彪镇 M1 铜鉴 M1:56) 2.“射礼”类 陕西凤翔高王寺窖藏铜壶  
3.“狩猎”类 河北平山三汲 M8101 铜鉴 M8101:4) 4.“弋射”类 河北平山三汲 M8101 铜盖  
豆 M8101:2) 5.“投壶礼”类 山东省长岛县南长山岛出土战国铜提梁壶

争”三种场景。“宴饮”场景下部为“投壶礼”场景,其最左侧为一投壶,壶内插有四矢,壶右侧并排立有五人,右手均持有一矢,从右向左,五人的动作连贯起来刚好为投掷的整个过程,即依次表现手持矢从腰部到上举至头部再到投掷出的动作<sup>[20]</sup>。

#### (五)“弋射”类

本文将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用结缴的矢射鸟的题材归为“弋射”类。

标本河北平山三汲 M8101 铜盖豆 M8101:2, 此盖豆器盖图案由四组图案组成,两两重复,分别表现“宴饮”和“弋射”的场景;器腹及豆柄图案表现“狩猎”场景。涉及“弋射”部分的图案,上部为飞行中的鸟,其中四只被弋射之线缠住;下部有四人表现张弓欲射、射出、取获猎物等动作<sup>[21]</sup>。

### 五、非“战争”类用镞形制的再考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东周时期确实存在“战争”、“狩猎”、“射礼”、“投壶礼”、“弋射”等与“射”相关的活动,除“战争”外,其他活动所用青铜镞的形制仍不能确定。本部分将借助其他地区出土的相关考古材料,并结合相关文献就此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找到某些线索。

#### (一)“蒐礼”之用镞

本文中所述的“蒐礼”主要是指按照季节来进行的狩猎活动,这种狩猎活动往往带有军事演习性质,是当时统治者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且狩猎后往往会随之进行祭祀,因此是当时礼仪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周礼·大司马》中记载:“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遂以蒐田,……火弊,献禽以祭社。中夏,教茆舍,如振旅之陈。……遂以苗田,……车弊,献禽以享杓。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遂以猕田,……罗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吏,戒众庶,脩战法。……遂以狩田,……徒乃弊,致禽饩兽于郊,入献禽以享烝。”

关于每个季节“狩猎”的名称虽然存在争议,如《春秋繁露》记载便不同于《周礼》<sup>[22]</sup>,但是每个季节的“狩猎”都带有军事色彩却是不争的事实,《左传》中亦有这方面的记载<sup>[23]</sup>。本文将每个季节的“狩猎”统称为“蒐礼”,其用镞之形制应与战争所用形制一致,即主要形制为双翼镞、三翼镞、三棱镞。

#### (二)“射礼”之用镞

关于“射礼”用镞之形制,陈春慧认为平首圆身

镞是“射礼用恒矢”。《周礼·射鸟氏》:“射则取矢,矢在侯高,则以并夹取之”;可见矢是射入侯中的。除前文提到的陕西凤翔高王寺窖藏铜壶的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侯上插有两矢,上海博物馆藏椭圆形<sup>[24]</sup>的青铜器写实画像纹中的侯上亦清晰可见插入其中的两矢。因此,本文认为“射礼”之用镞应是双翼镞、三翼镞、三棱镞等锋刃镞,而非陈春慧所言。

#### (三)“投壶礼”之用镞

“投壶礼”之用镞,《礼记·投壶》有记载:“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郑注:“旧说云:矢大七分。”可见“投壶礼”之矢为“镞”与“箭杆”一体,用不剥皮的柘木削制而成,且形体甚小。因全为木质,即使葬于墓中,也难得保存下来。江苏邳江姚庄 M101<sup>[25]</sup>中曾出土漆箭杆一束(未见青铜镞),以木条作胎,上髹褐漆,长 7、直径 1 厘米,不知是否为“投壶礼”所用。

#### (四)“弋射”之用镞

关于“弋射”用镞之形制,前文提及两种观点。

第一种以宋兆麟为代表,持此观点者的考古证据主要有广东四会鸟旦山<sup>[26]</sup>、潮安鮑靴子山<sup>[27]</sup>、江苏邳县冯庄<sup>[28]</sup>所出土的具有上述特征的青铜镞,另外江苏邳州九女墩<sup>[29]</sup>、四川新都<sup>[30]</sup>亦出土同类镞。但是此种形制的青铜镞作为“弋射”用镞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出土数目极少,且多为南方所见,本文所收中原地区仅洛阳中州路 M2719 出土 1 件。这种现象或与用途有关,但与有“弋射”题材的写实画像纹铜器流行区不合,亦不能体现弋射在当时社会贵族中的盛行程度。

2. 出土此种形制的镞的上述几座墓葬中相关“弋射”迹象不明显,如不见最能体现“弋射”现象的“缴线轴”等。

3. 同时期的甚至同单位出土的矛上亦有环形钮,其作用应是系瓖珞以装饰。以此推测此种形制的镞上的环形钮可能具有相近的用途,比如系以装饰物,可方便射出后找回。《周礼·射人》、《周礼·射鸟氏》中都有相关把射出的箭取回的记载。

另一种以丛文俊为代表,持此观点者的考古证据主要是曾侯乙墓出土了相关“弋射”用器,而与之共出的青铜镞便是“弋射”之用镞<sup>[31]</sup>。除曾侯乙墓外,长沙浏城桥 M1<sup>[32]</sup>、襄阳蔡坡 M12<sup>[33]</sup>、江陵天星观 M1<sup>[34]</sup>、江陵雨台山<sup>[35]</sup>M89、M100、M159、M170、M197、M200、M206、当阳曹家岗 M5<sup>[36]</sup>、江陵溪峨山<sup>[37]</sup>M2、M7、江苏邳江姚庄 M101<sup>[38]</sup>亦出“弋射”用器。

考证之前,应该指出的是根据上述几座墓来考察“弋射”用镞的形制存在一定不合理性:

1. 首先必须承认上述几座墓中所出“缴线轴”或“绕线棒”为“弋射”用器。以上几座墓中,除襄阳蔡坡 M12、当阳曹家岗 M5 与曾侯乙墓一样,除了出土“缴线轴”或“绕线棒”外,还出土弹簧等其他“弋射”迹象,其他均只出土“缴线轴”或“绕线棒”。因此,为更加稳妥,本文只采用曾侯乙墓、襄阳蔡坡 M12 与当阳曹家岗 M5 之材料。

2. 以上几座墓多为南方楚系墓葬,且数量有限,典型性不强。

鉴于以上两点,本文只对“弋射”用镞之形制提出一种可能性,认为“弋射”用镞之形制可能并不仅限于曾侯乙墓出土青铜镞之形制一种,即本文所分的有铤异形镞第二类,双翼镞、三翼镞、三棱镞亦有可能用于“弋射”,“弋射”所用的发射工具应该以弓为主。至于三晋两周地区“弋射”用镞之具体形制何如,仍需寻找更好的证据加以证明。

## 六、结 语

通过前文对“射”所用各类“镞”的具体形制的考察,本文认为“战争”、“蒐礼”、“射礼”等所用青铜镞的主要形制为双翼镞、三翼镞、三棱镞等锋刃镞。“弋射”用镞之形制可能并不仅限于曾侯乙墓出土青铜镞之形制一种,本文所分的双翼镞、三翼镞、三棱镞亦有可能用于“弋射”。“投壶礼”用镞之形制则因材料太少无从考证。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往及本文所认为的某些“异形镞”,可能并非“镞”。如四川新都<sup>[39]</sup>与安徽青阳县龙岗<sup>[40]</sup>出土的“异形镞”,出土时铤部均套入管状套中,有可能不会被当作“镞”来使用。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sup>[41]</sup>出土的 3 件被命名为“铜鸣镝”的“有銎异形镞”,原报告认为是箭杆的鐏部。笔者认为报告的认识合理性更大,箭杆尾部存在这样的结构,更利于把箭抵在弦上。若此,与其形制相似或接近的上村岭虢国墓地 M2001:391-1、太原金胜村 M251:495-3,也可能是箭杆的鐏部。洛阳凯旋路南 M470:8C 与矛镞形制类似,但銎孔径偏小,亦可能是箭杆的鐏部。

第 6 期,第 75~77 页。

[2] 丛文俊《弋射考》,《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第 220~232 页,知识出版社,1993 年。

[3] 何弩《缴线轴与赠矢》,《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1 期,第 46~48 页。

[4] 陈春慧《赠矢、恒矢、绕缴轴——兼与何弩先生商榷》,《文博》1998 年第 6 期,第 50~53 转 65 页。

[5] 石岩《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年。《长身异形镞考辨》,《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2 期,第 38~41 页。

[6] 本文所采用的材料,均为简报或报告中有图或有标本描述的单位,对于无图亦无标本描述的单位,本文不作采用。

[7] 叶小燕《中原地区战国墓初探》,《考古》1985 年第 2 期,第 161~172 页。

[8]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9] 张辛《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 年。

[10] 宋玲平《晋系墓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杨建军《三晋东周铜器墓初论》,《中原文物》2005 年第 3 期,第 33~46 页。

[12] 刘绪《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文物季刊》1993 年第 4 期,第 85 页。

[13] 杨泓《战车与车战——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一》,《文物》1977 年第 5 期,第 82~90 转 22 页。

[14] 河南陕县 M2005、上马墓地 M6244 两者均未出土铜礼器或陶礼器组合,且前者无葬具,后者葬具虽有一椁一棺,但墓室面积仅有两平方米左右。河南洛阳唐宫西路 C1M7983、C1M7984 被盗严重无法知其共存器物;河南洛阳凯旋路南 M450 未出土铜礼器或陶礼器;但这几座墓葬具为一椁一棺或二椁一棺,墓室面积均大于 6 平方米,等级应该较高。

[15] 郭宝钧著《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 年。

[16] [2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 5》,第 157~19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

[17]《周礼·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获三容,乐以《骜虞》,九节五正。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获二容,乐以《狸首》,七节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蘋》,五节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芣》,五节二正。”

[18] 韩伟、曹明檀《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

[1] 宋兆麟《战国弋射图及弋射溯源》,《文物》1981 年



《文物》1981年第1期,第15~17页。

[19]《礼记·投壶》对整个过程的记载颇为详尽,文中不再赘述。

[20]郭贤坤《刻纹提梁壶与战国时代的投壶礼》,《体育文史》1995年第3期,第60页。

[22]《春秋繁露》卷第十:“田之散名:春苗、秋搜,冬狩,夏猕。”

[23]《左传》襄公十三年:“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於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24]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纹》,《文物》1961年第10期,第26~28页。

[25][38]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第19~43页。

[26]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乌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第102~108页。

[27]杨豪《介绍广东近几年发现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61年第11期,第599~600页。

[28]南京博物院《江苏邳海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4年第1期,第19~25页。

[29]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江苏邳州九女墩春秋墓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9期,第13~24页。

[30][39]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第1~16页。

[31]关于曾侯乙墓弋射用器谭白明已详细考释过,可参见谭白明《曾侯乙墓弋射用器初探——关于曾侯乙墓

出土金属弹簧与“案座纺锤形器”的考释》,《文物》1993年第6期,第83~88页。而“与之共出的青铜镞即为弋射之用镞”之考释,可参见何弩《缴线轴与赠矢》,《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第46~48页。本文对此二问题不再赘述。

[32]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59~72页。

[33]襄阳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76年第11期,第65~71页。

[34]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71~115页。

[35]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原报告中叙述有8座墓共出土26件绕线轴,但查看其墓葬登记表仅有7座墓共出土24件绕线轴。

[36]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第455~499页。

[37]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江陵溪峨山楚墓》,《考古》1984年第6期,第515~527页。

[40]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2期,第18~24页。

[41]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原平市博物馆:《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第二次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第3~13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上接15页)

境,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充分验证。

在该地点还采集到一件制作精美的半月型刮削器。同类型的器物在薛关和柿子滩也有发现,只不过在加工方法上有所差异。该地点采集的半月型刮削器是从两面加工,它器形精致,刃口锐利,刃缘匀称,小石片疤短宽,层层叠叠,其两端还修理成了两个非常扁圆的尖。它是用指垫法加工成的最好的标本之一。而薛关和柿子滩所出土的半月型刮削器,则是采用单面修理,器物一侧单向加工成半月形钝厚刃缘,一侧则折断平齐作为把握的厚背,背面留有大片岩面。

由于该地点的石制品全部采集自地表,又没有地层依据。所以,本文对该地点文化面貌的研究也只能借助薛关和柿子滩的现有资料作比较,为上述

论点提供一定的基础。

本人在银川和水洞沟遗址考察期间,宁夏博物馆的钟侃和董居安二位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石制品线图由畅红霞先生绘制。特致谢意。

#### 参考文献

- 1.王向前等《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期。
- 2.解希恭等《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 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
- 4.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技出版社,1987年。
- 5.丁建平《薛关遗址的尖状器》,《文物世界》2004年第6期。